记　忆

映山红

■李　迅

记得那是2018年末的一天，我和几位作家来到广东清远瑶安瑶族乡。

瑶山下雪了。雪不大，细细碎碎的，像是谁在天上筛着极细的米粉。雪落在瓦檐上，落在竹梢上，落在柴房门口那堆劈好的木柴上，悄无声息。柴房里生着一堆火，火苗舔着干柴，火星子往上蹿，又落在泥地上，一明一灭，像极了天上的星星。

我们围坐在火堆旁，听田心村的瑶族老人标叔讲故事。他年纪大了，声音有些沙哑。可那声音却有一种奇异的魔力，把我们带回了1935年的冬天。

“牵牛岭战斗结束之后，红军部队趁夜翻过大山转移了。”标叔说，“第二天，田心村的村民上山打扫战场，在竹林中发现了6名牺牲的红军战士，把他们安葬在山坡上。”

他顿了顿，接着说：“但他们不知道的是，竹林深处还有一个人。”

柴房里静了下来。只有火星在噼啪作响。

“那个小战士叫王贵，湖南永州人，年纪很小，大家都叫他‘红小鬼’。他在战斗中负了伤，肩膀被砍了一刀，血流了一地。他掉队了，一个人蜷在竹林里，身上只穿着红军的单衣短裤，光着脚，在冬天的山里，冻得瑟瑟发抖。”

“他是我母亲黄红妹和瑶族同胞李河玉上山挖竹笋的时候发现的。当时，那个小战士昏睡在一丛映山红旁边。”标叔的声音忽然轻了，轻得像柴房外那层薄薄的细雪。

映山红！

我的心忽然被什么撞了一下。映山红，就是杜鹃花。瑶安的山上，到处都有映山红。春天的时候，漫山遍野地开，红的，粉的，一丛一丛，一坡一坡，像是天上的红霞铺在山间和田畴。然而1935年的1月，是瑶山最冷的时节。

“虽然是隆冬，映山红没有开，但到了春天，它会开得很灿烂的！”标叔说。他的声音忽然升高了，像是那堆篝火里蹿起一朵高高的火苗。

“我母亲看到他的时候，他已经快不行了。肩膀上的伤口溃烂了，人烧得迷迷糊糊。我母亲把他背回了家，给他换上我父亲仅有的衣裤和鞋子，喂他吃稀粥，用土方子给他治伤。”

“就是用艾叶的嫩尖儿，还有山苍子叶，捣碎了敷在伤口上。”标叔说，“我们瑶家跌伤撞伤，都是用这些草药治好的。”

王贵在黄红妹家里养伤，一住就是三四个月。

三四个月，正好是一个春天啊！我想象着那个春天。瑶山的雪化了，溪水涨了，竹笋从土里钻出来了。映山红开了。先是山脚，再是山腰，最后是山顶。一丛一丛地开，一片一片地红，像是有人在山间点了一把火，那火是红的，是粉色的，是热烈的，是生猛的……

王贵就住在这样的春天里。他住在黄红妹家那座木头搭起的瑶家木楼上，透过窗子，能看见山上的映山红。他的伤口在愈合，身体在恢复。黄红妹每天给他换药，喂他吃粥，给他讲瑶山盘王的故事。他听得懂吗？他是湖南永州人，大概听不懂瑶族话。可有些话，不用听懂，也能意会。

“我母亲每次讲起这件事，讲着讲着就会流泪。”标叔说，“她说，那个孩子又矮又瘦，可怜得让人心疼。她给他换药的时候，他疼得直哆嗦，可咬着牙不哭。她问他疼不疼，他说不疼，红军不怕疼……红军连死都不怕。”

是的，红军不怕疼，红军不怕死！

火光在标叔的脸上跳动着，他的眼睛里有泪光。“我母亲救下王贵的时候，她自己家里也很穷。”标叔说，“我父亲的衣裤鞋子，是家里仅有的几件像样的衣物。她把父亲的衣裤鞋子给王贵穿上，父亲就只能穿着单衣过冬。”

他停了一下。“可我母亲觉得值。她说，红军是为了穷人打仗的，红军有难，咱们瑶人不能不管。”用现在的话说，这就是瑶民和红军的鱼水情。

标叔说，王贵的伤好了之后，就走了。他离开了瑶山，离开了黄红妹的家，离开了满山坡的映山红。

他有没有回来过？我问。标叔摇了摇头。“没有啦。走了就没有音讯了。”

柴房里又安静了。“我们的前辈虽然不识字，但都记得红军来过，记得红军是好人。”标叔说。

那天夜里，我躺在民宿的木板床上，听着窗外轻轻的落雪声，脑子里全是那丛映山红。隆冬里，它那光秃秃的枝干，在雪里紧缩着身子，像一丛没有生命的枯枝。可它的根却扎在瑶山的土里，扎得很深。它在等着绽放的时刻……

2026年9月，我随“重走长征路”采风团再次走进瑶安。

这一次，我想听标叔讲故事。我想再听他讲王贵，讲黄红妹，讲那丛映山红。可我到了田心村，才知道标叔两年前去世了。

木柴还堆在门口，可那个在柴房里讲故事的人，却走了……我不禁想起那晚的火堆、那晚的细雪、那晚标叔沙哑的嗓音……但我相信，红军的故事还在，它和瑶安同在。

我走出柴房，站在村口的门楼前。门楼上的楹联在阳光下清清楚楚：“革命伟业千山近，红军长征万里遥”。我抬头看那两行字，字迹深深凹进去，仿佛镌刻在这片青山之上。

我往山上走。走过石板路，走过吊脚楼，走到牵牛岭的山脚，抬头看山。映山红已经过了花期，可叶子还是绿的，密密匝匝地挤着，在山风里沙沙作响。我想起标叔说的那句话：“虽然是隆冬，映山红没有开，但到了春天，它一定开得很灿烂！”

春天里开得灿烂的那丛映山红，它的根扎在瑶山的土里，扎得很深。一年一年，冬天落了叶，春天开了花。落了又开，开了又落。

它的颜色、它的热烈始终没变。我知道，那是这片土地最深沉、最执着的颜色。

腊子口的路

■贾　永

感　念

腊子口的那条路，是从悬崖上垂下来的。

1935年9月，中央红军主力走出川西水草地，进入甘肃南部。

一路征战，一路减员。抵达岷山脚下时，队伍已是折损甚多。

腊子口，横亘在眼前。

两侧峭壁如削，中间一水奔流，一座独木桥卡在隘口。藏语里，腊子口意为“险绝的山道峡口”。

这是川西北去往甘南的唯一通道，也是红军北上抗日的必经之地。

国民党地方军阀鲁大昌部凭险固守，桥头碉堡森然矗立，机枪火力封锁桥面。

红军身后，追兵将至。聂荣臻回忆：“如果腊子口打不开，我军往南不好回，往北又出不去，无论军事上政治上，都会处于进退失据的境地。”

开路任务，落在了红4团肩上。

3个多月前，就是这个英雄的团队飞夺泸定桥，在死亡的夹缝中，为大部队抢出了一条生路。

夺占腊子口的艰难，丝毫不亚于夺取泸定桥。

团长黄开湘、政委杨成武率部一次次冲锋，又一次次被敌人的火力压了回来。红军队伍挤在隘口之前。

怎么办？怎么办？

绝境，催生逆向的智慧。既然水平前进的路已被封死，那就垂直向上，在绝壁的裂隙中寻觅生机，在千古峭崖之上，“生”出一条路。

9月16日夜，新的命令下达：正面继续强攻，同时派人攀上悬崖，前后夹击。

然而，攀上七八十米高、近乎垂直的断壁，谈何容易？

“我来试试！”

站出来的是一位苗族战士。他从贵州跟着红军一路北上。战友们不知道他的名字，只知道他的绰号叫“云贵川”。他自幼在深山采药，习惯攀岩走壁。

那一天，是农历八月十九日。薄云笼月，清光忽明忽暗。“云贵川”悄然贴上崖壁，崖下的人仰着头，只见一个模糊的影子，一寸一寸往上挪。铁钩探进石缝，“咔嗒”一声，又“咔嗒”一声。夜深人静，“咔嗒”声清清楚楚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崖顶垂下一条绳子。

那条绳子，是绑腿接成的。

一个连的战士顺着绳子攀上悬崖，站到了敌人的头顶。

9月17日拂晓，手榴弹从天而降，砸进敌阵——也许是觉得万无一失，守敌的碉堡居然没有顶盖，就像一圈矮墙。

敌人腹背受敌，阵地瞬间崩溃。

腊子口天险，就这样被打通了。

红军队伍从独木桥上跨过，继续北上。

几天之后，侦察员在哈达铺搜集到报纸，带来了陕北红军的消息。陕北是当时全国仅存的一块完整红色区域。

毛泽东大手一挥：到陕北，去找刘志丹！

从于都河到腊子口，将近一年时间，红军四渡赤水、巧渡金沙江、强渡大渡河、翻越雪山草地——高山大河、艰难险阻，一次次挡在面前，一次次勇敢跨越。

越过去，就是坦途。

91年过去，等级公路早已穿过腊子口，车来车往。很少有人知道，那个秋夜，一条由绑腿拧成的绳子，从崖顶垂下来，为一支身处绝境的军队打开了一条生路。

没有人知道“云贵川”的本名；他后来的去向，没有留下明确的记载。那条绳子，也消失在了漫漫征途中。

可那条路还在。世间的路，总是这样：前人拼死闯过去，后人才能放心走过去。

今天，从腊子口公路上走过的每一个人，都踏着当年那些闯关人开辟的道路。

一块门板

■张丽丽

精短小说

多年前，我被抽调到灌阳县委党史办，参与编修一本红军过灌阳的史料集。翻了半年资料，进度总体顺利，没想到却卡在一块门板上。档案里只有一行字：1934年冬，水车村村民翟顺修献门板一块，用于架设灌江浮桥。门板多大、什么木料、后来去了哪儿，这些信息都没有。

主任说，其他条目都齐了，这一条空着不行。于是我去了水车村。

翟明福69岁，是翟顺修的孙子。他在村口等我，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。

老屋还在，土墙，木门。门板矮了一截，底下垫着两块石头。翟明福说，这块门板是后来配的；原来那块，被爷爷扛去架桥了。爷爷常说，那年头，老百姓见了兵就怕。白军来过一回，骑着马、扛着枪，把百姓家的米搬走了，连下蛋的鸡也抓走了。爷爷拦了一下，被一枪托砸在脸上。

1934年冬，红军队伍从北边过来。村里人不明底细，都躲进了山。当时，家里两岁的孩子发着高烧。爷爷下山抓药，撞上了队伍。

他掉头要走，被一个战士叫住。战士问起孩子的病，回身叫来了军医。军医跟着他，背着药箱进屋，看病、拿药，不要钱。第二天，孩子退烧了。

爷爷感念军医救娃的恩情，见队伍里有伤员需要安置，便主动腾出屋子。先后有6个红军伤员住进他家养伤。奶奶给他们换药、做饭。伤员叫他“老乡”，他说：“别叫老乡，叫老翟。”

过了几天，江边来了队伍，要架浮桥，木板不够。爷爷先拆了桌子，还不够。他在门口站了很久，回屋拿了工具，把自家门板卸了下来。奶奶站在空门框前，风从那儿穿进屋，又穿回去。她抹了把眼睛，转身进了屋。

队伍开拔那天，一个战士把一床棉被塞到爷爷怀里。爷爷不肯要。战士说：“天冷，给娃盖。”爷爷抱着被子站在门口，半天没说出话。

我问：“那床被子还在吗？”翟明福说：“在县里的陈列馆。爷爷珍藏了40多年，1977年捐了出去。”

当年参加架桥的人，我还找到一位：张德胜，96岁，当年在江边打桩。老人耳朵背，说话已连不成句。他儿子给我放了一段10年前的录音。

录音里有杂音，老人说话慢。“钉子是我钉的。钉一下，我摸一下。都是老百姓的门板，我怕把它敲坏了。”

“11月的江水冷。桩子要打到江底，人得下去扶。老翟也下去了，腿在抖，牙在磕，却不肯上来。”

“桥成了，先头部队先过。大部队等了3天，敌机炸了多少回，记不清了。江里的水，是红的。”

“第五天，人过来了，数不清。马也踩，炮车也碾，板子咯吱咯吱地响。没断。”

录音到这儿断了。张德胜的儿子说，父亲后来去找过那块板子，没找着。他还说，父亲常常坐在江边一言不发；问他想什么，他答：“听水。”

后来，我去了一趟新圩阻击战史实陈列馆。副馆长姓范，他先领我看了那床棉被。被子叠得方方正正，展签上写着一行字：1934年冬，红军长征过水车村，赠村民翟顺修。

范副馆长又给我调出一份材料：1976年冬天，江里清淤，在河床上挖出过一块泡烂的木板。当时没人当回事，板子后来不知去向。材料后面附了一张照片。

我问：“有没有可能是翟顺修家的那块？”范副馆长说，说不准。那年冬天，前后挖出来的木料有17块，没人登记，也没人留下。他还说，那座桥上的板子有多少块，谁也说不清。

临走，他领我看了展厅。展墙正中写着一行字：湘江一战，中央红军由8.6万多人锐减至3万余人。

我说，被子的主人有名字，门板却对不上号。范副馆长半天没说话。后来他说，那座浮桥上，没有一块板子留下名字。

那本关于红军过灌阳的史料集出版后，我又去了一趟水车村。翟明福在门口劈柴。门框上贴着一张红纸，是新的。他说：“年年贴。奶奶走了以后，我自己贴。”他还说，爷爷每年冬天都要到江边坐一会儿。问他看什么，他说：“看水。”

我问：“爷爷是哪年走的？”他说：“1980年。”去世前，爷爷还讲过一句话——一块门板，能有多大的用？

他家老屋的门框还在，木纹很粗，修过两次。我伸手摸了一下门框，没敢多摸。

离开时，我朝那扇门敬了一个军礼。

红星耀天山

■宋　鹏

红色足迹

坐落于乌鲁木齐市天山区青年路的新疆革命军事馆，是一座镌刻边疆烽火记忆、承载戍边初心使命的场馆。它浓缩着波澜壮阔的峥嵘岁月，吸引着每一位渴望走进边疆红色历史的人。

步入馆内，浓郁的历史气息扑面而来。柔和的射灯光线洒在一件件沉淀着岁月痕迹的展品上，仿佛在唤醒它们曾经的记忆。

“白雪罩祁连，乌云盖山巅，草原秋风狂，凯歌进新疆。”1949年10月12日，第一野战军第一兵团数万兵马，西出玉门关，向新疆挺进。如今，新疆革命军事馆里陈列的进军新疆历史照片，正是这段征程的见证。它们的拍摄者之一，是随军西进的摄影员袁国祥。他的参军故事要从1949年8月说起。

1949年8月至9月，第一野战军以摧枯拉朽之势连克顽敌：兰州解放、西宁解放、银川解放……9月25日，在家乡张掖，高中毕业的袁国祥参加了第二军政治部召开的知识分子座谈会。会上，解放军干部畅谈全国解放形势，阐明进军新疆、解放大西北的任务。年仅17岁的袁国祥听得心潮澎湃，当即决定与几名同学一起参军。

入伍后，因学过照相，袁国祥被分配到第二军政治部宣传部，成了一名摄影员。他带着缴获的照相机，跟随队伍踏上解放新疆的征程。

1949年10月20日，和平解放的迪化（今乌鲁木齐）红旗如海，各族群众夹道欢迎解放军入城。入伍不到1个月的随军摄影员袁国祥登城楼、爬房顶，用镜头记录下迪化城头五星红旗升起、战士整装入城的历史瞬间。他的镜头里，有各族群众夹道欢迎解放军的场景，也有市民向战士献花的画面。

与这些照片相互印证的，是军事馆里展陈的一份套红印刷的《新疆日报》。报纸记录了1949年10月20日人民解放军进驻迪化的经过。一则题为《人民解放军今日来迪》的报道这样记述：“当人民解放军由吐鲁番启程西来的消息传出后，瞬息之间，整个迪化市便掀起一股欢欣鼓舞的热浪，大街小巷的每家门口，都悬挂着庄严的五星红旗，远望市区，变成了红旗的大海洋。”

报纸上的欢欣景象，定格了新疆和平解放的历史时刻；而五星红旗插遍天山南北，又经历了艰苦卓绝的进军。由王震率领的第一兵团第二军、第六军，在连续行军作战、未得休整的情况下，辗转3000多公里，到1950年1月进驻全疆各重要城市、军事要地，并接管千里边防。袁国祥跟随西进的队伍，骑着战马，踏戈壁、闯大漠、上昆仑，用相机记录下红旗插上帕米尔高原、漫卷天山的壮阔征程。

赛图拉是和田地区皮山县的一个乡镇。从军事地理上看，它是南疆的边塞要道。军事馆里关于人民解放军进军新疆、接管千里边防的展陈，让我对这个地名有了更具体的理解。1950年3月，第二军第五师第十五团的一个连队进驻赛图拉。守卡的国民党军士兵以为换防部队来了，哭喊着埋怨：“你们可算是来了，我们等着换防等了4年了。”看着解放军战士身上崭新的军服，他们羡慕地说：“什么时候又换装了？”解放军官兵看着这群衣着又脏又破、手脸黝黑、嘴唇干裂的国民党士兵，哭笑不得，不知说什么好。

“我们这支军队从井冈山走来，不怕一切困难，不惧一切敌人，逢山开路，遇水架桥，历经千百次胜仗，直到越过风雪祁连山，长途跋涉至新疆。”今年94岁高龄的袁国祥老人说到动情处，唱起了当年的战歌：“挺进！挺进！向新疆、向西藏、向帕米尔高原上大进军……”

军事馆里还设有马兰人和马兰精神专题展陈。我此前就知道林俊德院士的事迹，但看到他生命最后几天的细节，还是被深深地打动。

林俊德院士扎根新疆大漠戈壁52年，参加了45次核试验任务。2012年5月，林俊德被确诊为胆管癌晚期。得知手术或化疗可能让他再也不能工作后，他毅然放弃了治疗。在生命的最后阶段，他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“我还有要紧的工作要做”。后来，他干脆让医生拔掉引流管，在病房里支起了一张小办公桌。大家多次劝他休息一会儿，他一再摇头说：“不能躺下，一躺下就起不来了。”在生命进入倒计时的几天里，他更是争分夺秒地忘我工作，移交了手上的全部科研试验技术资料，反复叮嘱资料要整理、要保密。

新疆大地自古就涌动着赤诚爱国的热血情怀。军事馆里展示着新疆塔城地区爱国民主人士巴什拜·乔拉克倾尽所能，为入朝作战的志愿军捐赠一架喷气式米格战斗机的事迹；也展现了新疆阿克苏地区柯柯牙绿化工程带来的变化，解放军官兵与各族干部群众齐心协力，让荒漠披上绿装。从战争年代到和平年代，“军民同心”蕴藏在一个个具体的故事里，彰显在一处处动人的变化中。

一件件展品、一段段往事，最终汇成同一个主题。在新疆革命军事馆，深入学习新疆戍边建设史，让我愈发懂得“军队打胜仗，人民是靠山”的深刻道理。

沿着展览路线继续向前走，从历史深处来到新时代。走到卫国戍边英雄群体的雕塑前，灯光打在他们的脸上，有些凝重，但更多的是明亮。那些名字和故事，我在新闻里读过、在书里看过。在这座展馆里，我感觉它们和那些旧报纸、旧相机、旧军服连成了同一个故事。他们做的事不一样，但都让我深刻感受到使命重于生命的精神追求。

走出展馆，再次回望，历史与现实在此交汇。英雄不曾远去，精神生生不息，他们如同一个个火炬，照亮后人前行的路。他们的故事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天山儿女，在这片热土上为祖国的繁荣富强、边疆的稳定发展奋勇向前。

文学作品



战　马（油画）

李　卓　作

第6793期

社址：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34号　邮政编码：100832　查询电话：(010)66720114　发行电话：(010)68586350　定价每月20.80元　零售每份0.80元　承印单位：解放军报社印刷厂